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

——以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

□何朝晖 李萍

摘要 明嘉靖间无锡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保留了关于刊刻进度、生产周期、雇佣劳动力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论文以该书为例，探讨了明中叶书籍刊刻中不同工种的配置比例，书版的刊刻效率，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认为书中保留的印刷劳动力信息虽然较为完整，但并不能体现当时典型的劳动力配置比例；刻书过程中刊版效率存在较大波动，但部分刻工在全力投入的阶段刊版效率与其他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奇字斋与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松散的，刻工同时还为其他出版者工作，刻工承接刻书任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从该书提供的信息可一窥明中叶刻书作坊运作的方式与刻工的从业状态。

关键词 明代 雕版印刷 出版经济 劳动力 生产效率 刻工

分类号 G23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6.015

中国古代刻书业中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是中国古代印刷经济史、出版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前学界关于印刷经济史、出版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关注书籍价格、广告营销、印数与市场等方面，对于生产流程、生产效率、劳动力组织等问题较少措意。在古代雕版印刷的各种劳动力中，对刻工的研究相对较多。版本学家较早关注刻工，把刻工作为古籍版本鉴定的一种重要依据^①。对于刻工群体的构成方式、工作状态和个人生活，一些学者作了有益的探索^②。对于雕版生产中的写工、刷印工、装潢手等其他劳动力，学界虽有一定研究，但

因资料有限，难以深入^③。本文以明嘉靖间无锡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探讨明代中叶刻书作坊中劳动力的构成、刻工的分工方式、生产效率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希望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生产流程和劳动力组织方式有所助益。

1 顾起经与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

顾起经(1521—1575)，字长济，又字玄纬，号九霞山人，礼部尚书顾可学嗣子。“素负才气”，由诸生进补国子监，七赴乡试皆不偶，以国子监生授广东盐课副提举，兼署市舶，寻署博罗县令，再迁大宁都司

① 相关研究有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日本《书志学》1934年第二卷第二号、第四号。冀淑英《谈谈版刻中的刻工问题》，《文物》1959年第3期；《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文献》1981年第七辑。何槐昌《宋元明刻工表》，《图书馆学研究》1983年第3期。李国庆《两宋刻工说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0年第2期。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附《刻工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明代刻工姓名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② 相关成果如杨绳信《从〈磻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29辑，1984年。朱太岩《漫谈写刻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第1、3、4期。曹之《古籍刻工概述》，《图书馆》1988年第5期。侯真平《明何乔远〈闽书〉刻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郭平兴《近代早期湖南刻工与技工研究》，《九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马培洁《鲍廷博知不足斋刻工研究》，《文献》2013年第1期。汪燕岗《论明代通俗小说版画刻工——兼谈版画刻工研究的学术意义》，《美术研究》2014年第2期。张秀玉《明清徽州刻工的生存考察》，《出版科学》2014年第4期。王静《〈嘉兴藏〉雕版刻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刘元堂《论北宋版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书画艺术》2017年第4期。

③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增订版)第三章专论“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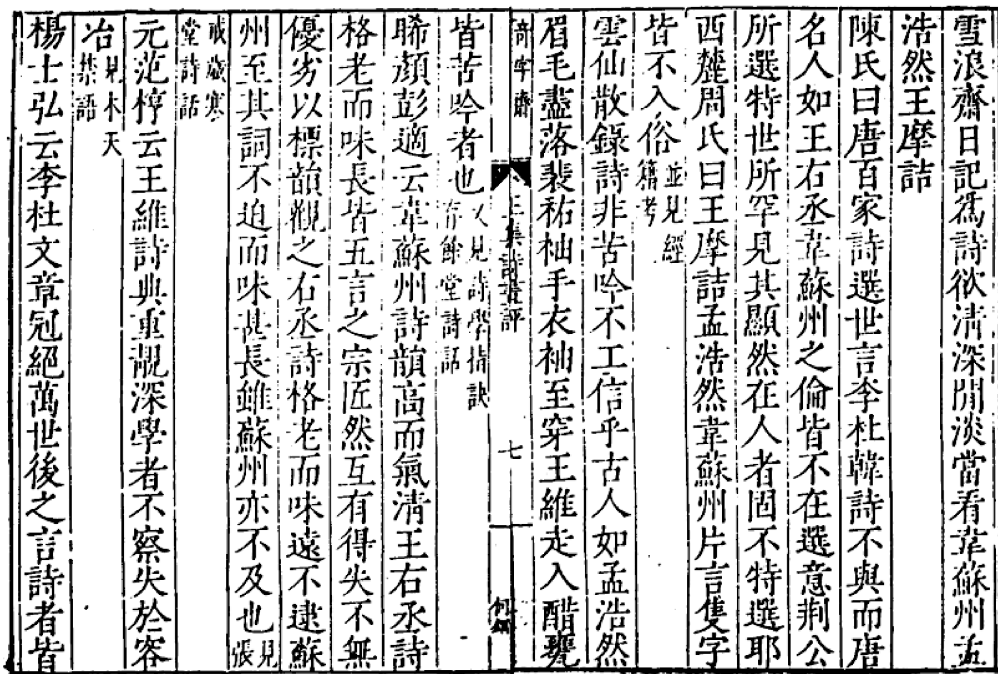


图1 《类笺唐王右丞集》书影

(取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册第226页)

都事,不赴。顾起经仕途不显,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编书、刻书上。他的著述十分丰富,据王世贞《顾参军玄纬先生志略》所载,有几十种之多。其中不少书带有明显的坊刻气息,很可能带有营利的目的^[1]。他刻书的堂号很多,除奇字斋之外,又有奇字馆、祇洹馆、众芳书斋等^①。顾起经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纂、注《类笺唐王右丞集》,嘉靖三十五年(1556)由奇字斋刻行。

嘉靖时期出版业已经从明代前期的萧条状况中恢复过来,刻书趋于活跃,为万历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类笺唐王右丞集》反映了嘉靖时期出版业的特征。该书是最早的王维诗文集注释本,反映了时人对唐诗的推崇,满足了市场上对唐诗普及性读物的需求。刻书字体方正规范,笔画末端棱角分明,程式化风格明显,已基本完成从具有浓郁书法韵味的手写体到整齐划一的匠体字的转变。(图1)匠体字的出现,意味着对书版写样者的书法水平要求降低,同时刊版的难度也降低了,雕版的速度更快。由于对写手和刻工的要求降低,书坊的劳动力来源更为广泛,进而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与刊版效率的提高结合起来,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

《类笺唐王右丞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唐王右

丞年谱》《唐王右丞集外编》《唐诸家同咏集》《唐诸家题赠集》《凡例》《开局氏里》等等;第二部分为诗集十卷,另有目录一卷;第三部分为文集四卷,另有目录一卷^②。卷首各部分的次序及在全书中的位置,各个存世印本不尽相同,可能是不同的印次或重装所致,但通过各部分后面的题识可以知道刊刻时间的先后。

该书对于出版经济史最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于书中关于刊刻过程的较为完整的记录。首先,在卷首《开局氏里》中记载了参与刻书的写工、刻工和装潢手姓名。

无锡顾氏奇字斋开局氏里:

写勘:吴应龙、沈恒(俱长洲人)、陆廷相(无锡人)。

雕梓:应钟(金华人)、章亨、李煥、袁宸、顾廉(俱苏州人)、陈节(武进人)、陈汶(江阴人)、何瑞、何朝

① 《类笺唐王右丞集》各卷末著录刻书地点多有不同。奇字馆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顾起经撰、王问辑并评《玄言斋集》,祇洹馆刻有《小十三经》,顾氏众芳书斋隆庆三年(1569)刻顾起经辑《增编会真记》。

② 有些藏本文集目录与诗集目录放在书前。文集目录后无刊刻时间识语,但紧接其后的《开局氏里》后的题识说明了整部书刊刻的起止时间,故文集目录应刊于后期。

忠、王诒、何应元、何应亨、何钿、何钥、张邦本、何鉴、何铤、王惟家、何钤、何应贞、何大节、陆信、何昇、余汝霆(俱无锡人)。

装潢:刘观(苏州人)、赵经、杨金(俱无锡人)^[2]。

其次,除个别情况外,书叶版心均有刻工姓名,可与《开局氏里》的名单相对照。

第三,在《开局氏里》末的识语中说明了刊刻整部书的起讫时间;在卷首之末和正文各卷卷末,有识语记录了各部分的刊刻时间、地点,见表1。

最后,诗集目录之末及某些卷次之末列有校阅人员名单。

表1 《类笺唐王右丞集》中的识语及对应刊刻时间

卷次	卷末题识	年	月	日
文集目录、开局氏里	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钺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			
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	嘉靖卅四年涂月白分锡武陵家墅刻	嘉靖三十四年	十二月	十五日
唐王右丞年谱	丙辰孟陬月得辛日锡山武陵顾伯子图籍之字刊	嘉靖三十五年	一月	初一
唐王右丞集外编	丙辰扶日刻	嘉靖三十五年		十日
唐诸家同咏集	丙辰上元雕版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	十五日
唐诸家题赠集	丙辰年初月人日付梓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	初七
凡例	丙辰春孟月晦刊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	二十九日
类笺诗集目录	岁丙辰中春上旬顾氏奇石清涟山院刊	嘉靖三十五年	二月	上旬
诗集卷一	岁丙辰上巳初吉锡山顾氏刻于待沐园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三日
诗集卷二	丙辰瘝月上弦长康外圃刻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初七或初八
诗集卷三	丙辰春莫浹辰梓于宛在亭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十二
诗集卷四	丙辰三月旬又八日立夏顾氏祗洹馆刻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十八
诗集卷五	丙辰余月四之日小满刻于对山开卷之阁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初四
诗集卷六	无			
诗集卷七	丙辰长瀛几望水木清华亭刻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十四
诗集卷八	丙辰夏五端三日餽于木瓜亭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初三
诗集卷九	无			
诗集卷十	丙辰皋月下澣之吉端居静思之堂刊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下旬
文集卷一	丙辰夏首顾伯子付刻于園□亭上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月初

卷次	卷末题识	年	月	日
文集卷二	太岁在丙辰夏孟月尾锡山顾起经与樵李陈荣四覆复于青□□中越月乃授之梓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月底
文集卷三	丙辰端午息玄室刊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初五
文集卷四	岁丙辰日北至夫漱山人顾起经跋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十五日前后

李国庆先生从刻工研究的角度评价道:“此本所载的版刻及匠户资料在明版中十分罕觐”^[3]。不仅如此,该书关于刻书时间的记载同样十分珍贵,是研究雕版刻书周期的很有价值的资料。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明代中叶书坊的刻书效率、刻工的工作方式等问题。此外写工、刻工、装潢手名录是关于书坊劳动力配比的宝贵资料,校阅人员名录也对我们认识书稿的审定、校对情况有一定帮助。校阅名录中的人并不一定实际从事书稿的审读、校对,更有可能只是挂名,因此本文对校阅情况不作讨论^[4]。

该书现存嘉靖三十五年顾氏奇字斋刻本多部,但版心刻工的著录却不尽一致,有的有缺损,可能是由于印次不同所导致的。为了使研究数据尽可能完备,本文综合了以下藏本的信息:(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册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2)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郑振铎旧藏本,索书号16297。(3)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本,索书号13506。(4)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本,索书号07623。

《类笺唐王右丞集》各部分叶数相加,共有557叶,即需刊刻书版557块。根据《开局氏里》末题识,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五日开雕,嘉靖三十五年(1556)六月一日竣工,工期共163天^[5]。

据表1,该书基本上是按照先后顺序刊刻的,即刻完一个部分,再开始刻下一部分,而不是各部分同时开雕。在诗集刊刻的后半段,文集开雕,诗集、文集的刻版工作同时进行,但在诗集、文集内部,又都是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的。

2 劳动力配置

《开局氏里》列出“写勘”3人,刻工24人,装潢手3人。“写勘”一词表明写工同时承担校对的任务。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开局氏里》后面有写明该书刊刻起讫时间的识语,表明这个名单是最后刻上

去的,但与书中版心上留下的刻工姓名比对,却发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开局氏里》中的顾廉、陈节、陈汶三人未在版心中出现,而版心上有的何朝宗、夏文德、夏昱三人则并未在《开局氏里》的名单里。如果《开局氏里》里的“何朝忠”与“何朝宗”为一人,则仍有两人未进入最后的刻工名录内。经查验,何朝宗、夏文德、夏昱三人所刻版面在所有刻工中是最少的,分别只有6版、2版、2版,这或许是他们未能进入最终名录的原因。

版心中的刻工人数加起来仍是24人,因此我们可以把3:24:3作为《类笺唐王右丞集》出版过程中写工、刻工与装潢手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否带有普遍性呢?笔者搜集了古书刊刻劳动力配置比例的其他几个案例。洪武十年郑济刻《宋学士文粹》卷末有题记云,该书共12万2千余字,6人写样,10人刊版,历时52日竣事^[6]。嘉靖二十六年刻《嘉靖南丰浚仪赵氏族谱》,末页有识语:“书林梓人江得成、南城、杨寿六、黄昭;光版人王四顺;印刷人江志夫;装订人陈松、胡昇。”^[7]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到中国传教。起初他们在马六甲建立了传教基地,从广东招募中国工匠、使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方法印刷中文版《圣经》。为了完成2000部《圣经》的刻印,需要雇佣9名刻字工、5名刷印和装订工^[8]。另据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提供的数据,如以刷印工数量为1,每批生产古籍200—500部,劳动力配比为:编校1:缮写2:雕版4:刷印1:装订4^[9]。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观察:

(1)刻工在所有工种中数量最多,在劳动力配置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由于刊版工作量大,技术含量高,因而所需劳动力数量多。在书籍印刷的成本中,雕版环节(不含板材)支出的成本所占比例也是最高的^[10]。

(2)写样、校对的人员数量,与刷印、装订大体相当。

(3)《类笺唐王右丞集》中刻工数量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几个例子,其中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顾起经想尽快将该书刻完,推向市场,在各卷之末记录刊刻时间有可能是这种督促程限心理的反映。因此他要尽可能多地吸纳刻工参与此书的刊刻。第二个原因正如下文将要揭示

的,许多刻工并非全力投入《类笺王右丞集》的刊刻。如果所有刻工都集中力量从事该书的刊刻,就不需要雇佣这么多的刻工。因此《类笺唐王右丞集》所反映的刻工数量比例是偏大的。

3 刊版效率

《类笺唐王右丞集》半页9行18字,一版刻满字数为 $18 \times 18 = 324$ 字。诗集双行小字注多,以满版、全为小字计算,最多可刻648字。实际上版面情况各不相同,大多数都有空白处,也有少量全部刻满的版面;有全是大字的,有全是小字的,也有大小字混排的。整版全刻大字与全刻小字的算术平均数是486字。考虑到诗集小字较多,诗集卷数多、每卷叶数多,我们可大致估算全书平均每个整版刻满大约为500字。再减去版面上的空白,我们大致可以假设每叶实际平均刊刻420字。

从整部书的刊刻效率来看,全书共557版,乘以每叶420字,共233940字,工期163天,每日平均刊刻1435字。平均到24名刻工身上,则每个刻工日均刻约60字。对照其他文献中关于雕版效率的记载,其雕版效率是很低的。

上文引明洪武十年(1377)郑济刻《宋学士文粹》,共有122000余字,10名刻工花了52天刻完,平均每人每天约刻235字。明正德五年(1510)重刊宋嘉泰《会稽志》,有王缙《书重刊会稽志序》云:“游付刊手王廷珊、夏存诚等十有五人,端相侵梓。经始于正月二十五日,落成于九月十日,凡一千六百工。板五百一十五,幅一千三十。”^[11]可知该书共有1030叶,动用15名刻工,工期为221天^[12]。1600“工”应为所有刻工的工作日之和。据此可算出平均每个刻工每个工作日刻0.64版。若以每版400字计,每日刻256字。前述米怜、麦都思等英国传教士在马六甲用雕版方法刊印中文版《圣经》时,曾仔细研究了雕版技术的生产效率。米怜估计一个好的刻工每天可以刻出150字。麦都思则认为刻工每天可以刻100字^①。麦都思又估算道,雇佣9名刻工刊刻《圣经》的2689个版面、共计1160548个汉字,大约需要三年时间^[13]。该《圣经》平均每版约432字。一年

① 《书籍的社会史》,第20、21页。麦都思的估计可能过低,因为按照这个数字根本不可能在三年内按时完成。若按米怜每日150字的估算,刻字工作两年多可完成。

以 365 日计,则平均每天需刻 1060 字,每个刻工日均 118 字。

刻工每日所刻字数的多少与字的大小有关,字体越大,所刻字数越少^①。此外还与字体刊刻难度、刊刻质量要求以及刻工自身的技术水平有关,因此难以划一,史料中各种记载出现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但刻工每日所刻字数的多少应有一个大致的行业标准,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内。以中等大小的字体、一般水平的刊刻质量和普通刻工的水平来估算的话,根据上引的几则材料,每日刊刻字数大体不出一二百字的范围。

对照以上记录,《类笺唐王右丞集》每个刻工平均每天仅刻 60 字显然是过少了。刻工们所承担的工作量很不均衡,参看表 2。某些刻工所刻版面甚少,如应钟、夏文德、夏昱 3 人所刻版数均不足 10 版,正是这些刻版少的刻工拉低了单个刻工每日雕版的平均数。

表 2 刻工分别刊刻的版面数量

刻工	卷首	诗文集	合计	刻工	卷首	诗文集	合计
何钥	17	37	54	余汝霖	0	16	16
何镒	23	29	52	何大节	0	16	16
何鉴	6	38	44	陆信	0	14	14
何钿	20	23	43	何瑞	7	7	14
王浩	2	36	38	张邦本	0	13	13
何应元	7	28	35	章亨	0	12	12
何钊	4	28	32	袁宸	0	12	12
何朝忠	2	27	29	应钟	1	8	9
何应亨	5	23	28	何朝宗	2	6	8
何昇	0	23	23	夏文德	0	2	2
何应贞	0	21	21	夏昱	0	2	2
王惟棠	4	17	21	佚名	2	1	3
李煥	0	16	16	合计	102	455	557

因此考察《类笺唐王右丞集》刻工雕版的效率,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承担任务较多的刻工。如表 2 所示,刊刻版面最多的是何钥、何镒、何鉴、何钿 4 人。刻版最多的何钥共刻 54 版,假设从开工到竣工何钥每天都在工作,则其刊版效率为:

$$54 \text{ 版} \div 163 \text{ 日} \times 420 \text{ 字/版} = 0.33 \text{ 版/日} \times 420 \text{ 字/版} = 138.6 \text{ 字/日}$$

这个数字与上文所引几则材料的记载基本一致。在半年时间里刻工每天都出工,可能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我们可以把考察时间范围缩小,以期进一步接近真实。通过观察、统计可以发现,刊刻诗集卷二、卷三时,所有刻工完成的版面与刊刻起讫时间之比最高,也就是整体刊刻效率最高。此外从卷四以后文集也开始开雕,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对诗集卷二、卷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相对而言比较方便观察刻工效率。诗集卷一刊刻结束之日是嘉靖三十五年上巳,即三月初三;卷二结束日期是“寤月上弦”,是三月初七或初八;卷三结束之日是“春莫浹辰”,三月十二日。诗集卷二、卷三共 92 个版面,从三月初三至十二共 9 天,日均刻 10.22 版。参加这两卷刊刻的刻工有 16 人,人均每日刻 0.64 版,换算成字数为约 269 字。具体到某些个人则更高。如王浩在这两卷中承担了 10 版,日均 1.11 版,约 466 字;何钥、何应贞分别承担了 8 版,日均 0.89 版,约 374 字。这些数字已大大超出了前面几则材料记载的每日刻字数值的范围,揆之常理,也令人难以置信^②。

这迫使我们考虑另一种可能性:诗集卷二、卷三很可能并不是等到卷一刻完以后才开始刊刻,而是之前就已经把写好样的版面分配给各个刻工,即刻工们在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三日以前就已经开始刊刻这两卷书版了。因此更好的考察方式是从整部书开工日期开始,综合考察头几部分的刊刻效率,这样可以更好地限定工作范围和工作时间,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表 3 对承担版面数量最多的 4 个刻工,从整部书开雕到卷三完成,分 3 个时间段进行了统计,通过相互对照,力求尽量准确地估算刻工的工作效率。

① 如《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刷印工价并颜料纸张定例》:“刻一寸至一寸五分大字,每人日刻十二个字;二寸五分至三寸五分大字,每人一日刻六个;四寸五分至五寸五分大字,每人一日刻四个;六寸五分至七寸五分大字,每人一日刻三个;八寸五分至九寸五分大字,每人一日刻二个;如过一尺至一尺四寸大字,每人一日刻一个。”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下),广陵书社,2007 年,第 668—669 页。

② 以王浩为例,若每日刻 466 字,以每日工作 12 小时计,每小时需刻约 39 字,不到两分钟就需刻出一字,这是不大可能的。

表3 工作量最大的4名刻工在最初阶段的刊版效率

时间段	天数	何钥		何钿		何镒		何鉴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开工至 凡例刻完	44	11	0.25	17	0.39	16	0.36	6	0.14
凡例刻完至 卷三刻完	42	21	0.5	13	0.31	12	0.29	14	0.33
开工至 卷三刻完	86	32	0.37	30	0.35	28	0.33	20	0.23

由表3可见,在诗集卷三完成前,这几名刻工的平均工作量在日均0.5版(210字)至0.14版(59字)之间,总平均数为日均0.32版(134字),大体符合前述几则材料的记载。这应该是较能反映真实状况的刻工刊版效率数据。这个统计分析也证明诗集卷二、卷三的部分书版在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初三之前就已经开雕了。

4 刻工的工作方式

从该书版心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刻工一般一次连续刻1至4个版面,以2个版面比较常见。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并非刻完一卷再刻下面一卷,而很可能是交叉进行。

此外,有的刻工承担的任务多,有的承担任务少,差距非常大。不同卷次、时间段统计出来的整体刊版效率很不一致,具体到同一个刻工,在不同阶段的刊版效率高低之差也十分明显,令人疑惑。比如按照以版面除以天数的计算方法,诗集卷二、卷三日均刊刻版面达到10.22版;诗集卷四37版,6天刻完,日均6.17版;诗集卷五48版,15天刻完,日均3.2版;诗集卷六、卷七共63版,10天刻完,日均6.3版;诗集卷八25版,18天刻完,日均1.39版。如果说因为诗集卷四以后文集同时开雕,分去了一部分劳动力,导致诗集刊刻效率降低,也很难说得通。比如诗集卷八的刊刻时间主要在四月下旬,同一时间文集卷二的刊刻在进行,而文集卷二25版,用时约28天^①,日均仅0.89版左右。诗集卷八与文集卷二刊版效率相加,日均也仅有2.28版左右,难以和其他部分相比。就单个刻工而言,表4比较了王诰、何鉴、何钥、何应贞、张邦本刊刻诗集卷二、卷三时与刊刻诗集卷四时的刊版效率变化。

表4 单个刻工刊版效率的变化

(单位:版/日)

卷次	王诰	何鉴	何钥	何应贞	张邦本
诗集卷二、卷三	1.11	1	0.89	0.89	0.78
诗集卷四	0.67	0.33	0.5	0.33	0.33

由上表可见,诗集卷二、卷三刊版效率最高的几名刻工,在刊刻诗集卷四时生产效率显著下降。刊刻诗集卷四时,文集卷一有可能已经开始刊刻^②,诗集卷四刊刻效率的下降是否有可能是分心于文集卷一的刊刻所导致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文集卷一的刊刻中,何钥、王诰分别承担了5版、2版,其他三人则均未参与。可见单个刻工的工作效率在《类笺唐王右丞集》各部分的刊刻中确实呈现出大幅波动和不均衡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唯一可能的答案是这些刻工在全书刊刻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力是不均衡的,有的时候是全力投入,有的时候则并非如此。从该书的刊刻质量来看,这些人都是职业刻工,而非在农闲时偶尔从事刻书补贴家用的业余刻工^③。职业刻工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大约是需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的。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刻工分散了他们的精力,转移了他们的劳动力?似乎只可能有一种解释:他们在刊刻《类笺唐王右丞集》前后,还承担了其他书籍的刊刻。

通过检索《明代刊工姓名索引》,笔者将《类笺唐王右丞集》中的刻工参与其他书籍刊刻的情况列成下表。

由表5可见,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万历二年(1574)的近三十年间,这批刻工以群组的形式参与了许多书籍的刊刻。从嘉靖三十三年(1554)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十多年,是这批刻工合作最紧密的时期。他们中间很多来自同一个家族,如何钥、何镒、何鉴、何钿、何钊,何应元、何应亨、何应贞,很显然是同族、同辈兄弟。从刻工的组合看,血缘关系是

① 文集卷一末题识的时间为“丙辰夏首”,即四月初;文集卷二末题“丙辰夏孟月尾”,即四月底。故大致估计为28天。

② 诗集卷四的刊刻时间是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文集卷一是四月初完成刊刻的,何时开始刊刻不详。两部分的刊刻有重叠的可能,也有可能并未重叠。

③ 明代建阳,清代广东顺德马冈、四川岳池都有农闲时业余从事刻书者,甚至包括妇孺。

表5 《类笺唐王右丞集》刻工参与其他书籍刊刻情况

	何 钥	何 鑑	何 錡	何 鈴	何 瑞	何 昇	何 應 亨	何 應 貞	何 大 節	王 浩	王 惟 宗	余 汝 霖	張 邦 本	章 亨	袁 宸	人 數
嘉靖二十六年 《江阴县志》	⊗		⊗		⊗	⊗	⊗	⊗								6
嘉靖二十七年华云 太华书院刻《韦刺史 诗集》	⊗	⊗	⊗	⊗	⊗		⊗	⊗								7
嘉靖三十三年东吴 书林刻《方山先生文 录》	⊗		⊗			⊗	⊗	⊗	⊗	⊗	⊗	⊗	⊗			10
嘉靖四十年刻《浙江 通志》	⊗	⊗	⊗	⊗	⊗	⊗	⊗	⊗	⊗			⊗	⊗			12
嘉靖四十五年 《宋元通鉴》	⊗					⊗	⊗	⊗		⊗		⊗	⊗	⊗	⊗	9
嘉靖四十五年凌稚 德刻《风笙阁简钞》	⊗	⊗	⊗	⊗	⊗			⊗			⊗				⊗	8
嘉靖间刻《螭螭集》	⊗					⊗	⊗	⊗								4
隆庆三年吴绅刻《便 产须知》	⊗															1
隆庆六年施观民刻 《遵岩先生文粹》	⊗		⊗			⊗	⊗									4
隆庆间顾氏众芳书 斋刻《增编会真记》		⊗		⊗								⊗	⊗			4
万历年顾氏奇字 斋刻《国雅》《续》	⊗	⊗														2
万历二年施观民刻 《虞斋三子口义》	⊗					⊗		⊗				⊗	⊗			5

注:本表信息来自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表示参与刊刻^①。
合作的一种纽带,但这种纽带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批刻工的籍贯和活动区域基本都集中在太湖周边、长三角地带,所服务的对象既有顾起经、凌稚德这样的普通士人,也有曾做过常州知府的施观民这样的地方官员,他们还官府刊刻过《江阴县志》《浙江通志》等方志。如果从《类笺唐王右丞集》算起,直到万历初年,他们一直在为顾氏书坊刻书,时间长达20年。但很明显,这批刻工绝不仅仅只为顾氏刻书,他们对雇主的选择比较自由、广泛。他们与顾氏书坊是一种基于特定刻书任务的松散雇佣关系。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刊刻《类笺唐王右丞集》时,有的刻工承担的任务很多,有的只承担很少的版面;有的刻工只在前期参加诗集的刊刻,有的到后期刊刻文集时才加入进来^②;同一个刻工,有时刻书效率很高,有时同样的时间却只有很少的产出。多半是因为他们同时在承担其他书籍的刊刻,甚或是其他雇主分派的工作。他们领受《类笺唐王右丞集》的刊刻任务,具有一定的间歇性、随意性。

5 几点结论

(1)《类笺唐王右丞集》大体上是按先后顺序刊刻的,但各部分刊刻又有所交叠。诗集未完成时,文集已开雕。而在诗集内部,各卷亦不必待前卷完全刻好后再开雕。

(2)参与《类笺唐王右丞集》刊刻的24名刻工并非全程、全力投入该书的绣梓。因此该书《开局氏里》所列的各工种比例并不能体现古代雕版印刷最佳的劳动力配比,也并非典型的劳动力配比。如果所雇刻工全力参与,所需的刻工数量要少得多^③。

(3)《类笺唐王右丞集》刻工满负荷下的刊版效率约为日均130余字,与根据其他资料对古代刻工工作效率的估算大致吻合。

(4)顾氏奇字斋与刻工之间是一种松散的雇佣关系,奇字斋的刻工队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刻书任务随时从劳动力市场上招募刻工。这或许是当时书坊运作的一种常态。

(5)刻工以群组的方式工作,他们往往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结合起来。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雇主,刻工领受刻书任务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他们可以为多个雇主服务。这很可能是当时刻工的一种普遍的从业模式。

参考文献

-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二十《顾参军玄纬先生志略》[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北京出版社,1997.455-458.
- 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册.齐鲁书社,1997.250.
- 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05.
- 何朝晖.鉴定、参订与校阅:明后期刊本中的著作参与方式述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9-57.
-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177,224.
-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M].贾卫民,李晓亚,整理.中华书局,2006.358.

① 由于刻工在版心留名有时会名字简写、缩写、别写,因此同一个人可能会有好几个名字。如何昇又署“何升”,何钥又署“何俞”,王浩又署“王浩”,何大节又署“大节”,何应元又署“何元”,何应亨又署“何亨”,何应贞又署“何贞”,张邦本又署“张本”,王惟宗又作“王宗”,余汝霖又署“余庭”“余廷”“俞廷”“俞庭”“于汝霖”,等等。笔者判断不同的名字是否为同一人时,并不是孤立地进行判断,还要看该书刻工中是否还有其他曾与之共事过的人。

② 前者有章亨、张邦本、李焕、何应贞,后者有何瑞(参加卷首刊刻)、何朝宗。

③ 如按何钥、何錡、何鑑、何鑑诗集卷三前的平均刻版效率日均0.32版计算,在同样的时间内刻完全书仅需11名刻工。

- 7 田涛.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M].中华书局,2002.33—35.
- 8 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M].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
- 9 宋原放、王有朋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第一卷(古代部分)[M].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612.
- 10 何朝晖.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7—28.
- 11 顾宏义.宋朝方志考:第3辑[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66.
- 12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172、229.
- 13 同8:36—37.

作者单位:何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济南,250100

李萍,济南大学图书馆,济南,250002

收稿日期:2018年4月23日

The Labor Allocation, Block Carving Efficiency and the Cutters' Workflow in Mid-Ming

—An Example of *Categorized Annotations of Tang Poet Wang Wei's Collected Works* Printed by Gu Qijing's Qizi Zhai

He Zhaohui Li Ping

Abstract: Categorized Annotations of Tang Poet Wang Wei's Collected Works printed by Gu Qijing's Qizi Zhai in the Jiajing era exceptionally retained the rich information of production schedule, circle and labor force. The paper probes the labor allocation, woodblock carving efficiency and the workflow of cutters based on the records kept in the book. The authors argue that although the record of labor force in the book was relatively complete, it could not reflect the typical labor allocation ratio at that time. The woodblock carving efficiency has great fluctuations, while some cutters' efficiency wa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documented in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tters and the printing shop was loose. The assignments cutters accepted were not limited to a single printing shop or a single book.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is book we can take a glimpse at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of printing shops and the careers of cutters in middle Ming.

Keywords: Ming Dynasty; Woodblock Printing; Economics of Printing; Labor Force; Efficiency; Cutter



(接第 118 页)

Data Analysis on the Decline of Academic Research of Chinese Libr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ng Yixin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Chinese library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cluding the statistics of publication of monographs and journal papers and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the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Anti-Japanese war has had a profound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braries, that 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brary, which has caused great obstacles.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Library Science Monographs; Periodicals and Papers of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Association;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Process